

愚昧作為一種養料

談我的七十年代，只能談我愚昧的歷史。比起「無名」、《今天》和「星星」這幫人，我真是覺悟得太晚了。事實上，我在心裏對這些人一直帶着一種很深的敬意。因為一談到學畫的歷史，我總習慣把那時期的我與這些人做比較，越發不明白，自己當時怎麼就那麼不開竅。北島、克平他們在西單民主牆，在美術館外搞革命時，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畫石膏的興奮中。現在想來，不可思議的是，我那時只是一個行為上關注新事件的人：從北大三角地、西單民主牆、北海公園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宮的四月影會，到高行健的人藝小劇場，我都親歷過，但只是一個觀看者。「四五」運動，別人在天安門廣場抄詩、宣講，我卻在人堆裏畫速寫，我以為這是藝術家應該做的事。比如黃鎮¹參加長征，我沒覺得有甚麼特別，可他在長征途中畫了大量寫生，記錄了事情的過程，我就覺得這人了不起，他活得比別人多了一個角色。我對這些事件的旁觀身份的「在場」，就像我對待那時美院的講座一樣，每個都不漏掉。

記得有一次我去「觀看」《今天》在八一湖搞的詩歌朗誦會。我擠在討論的人群中，離被圍堵的「青年領袖」越來越近。由於當時不認識他們，記不清到底是誰了，好像

1 黃鎮，老紅軍，長征途中畫了大量寫生，成為中國革命史料珍貴文獻。曾任中國駐法國大使、文化部長。

長得有點像黃銳，他看到我，眼光停在我身上，戛然停止宏論。我尷尬，低頭看自己，原來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。入美院不久，教務處不知從哪裏找到了一堆校徽，綠底白字，景泰藍磨製，在那時真是稀罕的寶物。我們在校內戴一戴，大部分人出校門就摘掉。我意識到那天出門時忘了摘，於是馬上退出去，摘掉校徽，又去看其他人堆裏在談甚麼。

這個對視的瞬間，可以說是那時兩類學畫青年——有機會獲得正統訓練的與在野畫家之間的相互默許。我既得意於自己成為美院的學生，在崇高的畫室裏研習歐洲經典石膏，又羨慕那些《青春之歌》式的青年領袖。但我相信，他們一定也會在革命之餘，找來石膏畫一畫，也曾試着獲得進入學院的機會。應該說這兩條路線（覺悟和愚昧）在當時都具有積極的內容。

現在看來，我走的基本是一條愚昧路線，這與我的成長環境有關。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個個都如此。他們還不如我，一定沒有去過民主牆。這是一個北大子弟的圈子，這些孩子老實本分情有可原，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是家裏沒問題的：不是走資派，就是反動學術權威，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時就「自絕於人民」的，有些人上一輩是地主、資本家甚麼的，或者就是有海外關係的「特務」。所以，我的同學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媽的，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精神病的（在那個年代，家裏老大是姐姐的，成精神病的特多，真怪了！也許是姐姐懂事早壓力大的原因）。這些同學後來出國的多，我在異國街頭遇到過四個老同學：紐約



徐冰在花盆公社，1975

三個，曼徹斯特一個。這四人中，有兩個是爸爸自殺的，另兩個的大姐至今還在精神病院。（謝天謝地，我家人的神經基因比較健全，挺過來了。）

我們這些家庭有問題的孩子，籠罩在天生給革命事業造成麻煩的愧疚中。家裏是這樣只能認了，偏偏我們的老師也屬這一類。北大附中的老師，不少是反右時差點被劃成右派的北大年輕教員，犯了錯誤，被貶到附中教書。這些老師的共性是：高智商、有學問、愛思索、認真較勁兒。聰明加上教訓，使得他們潛意識中，總有要向正確路

線靠攏的警覺與習慣。這一點，很容易被我們這些「可教育好的子女」吸取。結果是，老師和同學比着看誰更正確。血緣的污點誰也沒辦法，能做的就是比別人更努力、更有奉獻精神，以證明自己是個有用的人。打死你也不敢有「紅五類」或當時還沒有被打倒的幹部子弟的那種瀟灑，我們之中沒有一個玩世不恭的，這成了我們的性格。

插隊

1972年鄧小平復職，一小部分人恢復上高中。由於北大附中需要一個會美工的人，就把我留下上了高中。鄧的路線是想恢復前北大校長陸平搞的三級火箭——北大附小→北大附中→北大附中高中→北大。但沒過多久，鄧被說搞「復辟」，又被打下去。高中畢業時，北大附中、清華附中、北京第一二三中的紅衛兵給團中央寫信，要求與工農畫等號，到最艱苦的地方去。此信發在《光明日報》上（後來才知道這是團中央某人授意的），形成了最後一個上山下鄉的小高潮。我們選擇了北京最窮的縣、最窮的公社去插隊。由於學校留我上高中，我比初中時加倍地為學校工作，長期熬夜，身體已經很差了——失眠、頭疼、低燒，只好把戰友們送走了，自己在家養病。半年後似乎沒事了，辦了手續，去找那些同學。我被分到收糧溝村，兩男三女，算是村裏的知青戶。

這地方是塞北山區，很窮。那年村裏沒收成，就把國家給知青的安家費給分了，把豬場的房子給我們住。這房



收糧溝村寫生，1974

子很舊，到處都是老鼠洞，外面一颳風，土就從洞中吹起來。房子被豬圈包圍着，兩個大鍋，燒飯和熬豬食共用。深山高寒，取暖就靠燒飯後的一點兒炭灰，取出來放在一個泥盆裏。每次取水需要先費力氣在水缸裏破冰——至少有一寸厚。冬天出工晚，有時我出工前還臨一頁《曹全碑》，毛筆和紙會凍在一起。

我是4月初到的，冬天還沒過，這房子冷得沒法住，我和另一個男知青小任搬到孫書記家。他家只有一個大炕，所有人都睡在上面。我是客人，被安排在炕頭，小任挨着我，接下去依次是老孫、老孫媳婦、大兒子、二兒子、大

閨女、二閨女，炕尾是個弱智的啞巴。這地方窮，很少有外面的姑娘願意來這裏。近親繁殖，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。這地方要我看，有點像母系社會，家庭以女性為主軸，一家需要兩個男人來維持，不是為別的，就是因為窮的關係。明面上是共產黨的一夫一妻制，但實際上有些家庭是：一個女人除了一個丈夫外，還有另一個男人。女人管着兩個男勞力的工本，這是公開的。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給光棍介紹個對象，女主人就會在村裏罵上一天：「哪個沒良心的，我死了還有我女兒……」好心人被罵得實在覺得冤枉，就會出來對罵一陣。如果誰家自留地丟了個瓜甚麼的，也會用這招把偷瓜的找出來。

村裏有大奶奶、二奶奶、三奶奶、四奶奶，我好長時間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後來在一個光棍家住了一個冬天，才知道了村裏好多事。收糧溝村雖然窮，但從名字上能看出，總比「沙梁子」、「耗眼梁」這些村子還強點兒。收糧溝過去有個地主，土改時被民兵弄到山溝裏用石頭砸死了，土地、房子和女人就被貧下中農給分了，四個奶奶分給四個光棍。搞不懂的是，這幾個奶奶和貧下中農過得也挺好，很難想像她們曾是地主的老婆。那年頭，電影隊一年才出現一次，可在那禁慾的年代，這山溝裏在性上倒是有些隨意：一個孩子越長越像鄰居家二叔了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反正都是親戚。

我後來跟朋友提起這些事，會被追問：「那你們知青呢？」我說：「我們是先進知青點，正常得很。」一般人都都不信。現在想想，先進知青點反倒有點不正常，幾個十八九

歲的人，在深山，完全像一家人過日子。中間是堂屋，左右兩間用兩個門簾隔開，我和小任在一邊，三個女生在另一邊。有時有人出門或回家探親，常常只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邊。早起，各自從門簾裏出來，共用一盆水洗臉，再商量今天吃甚麼。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，但絕無生理上的夫妻關係。

我十八九歲那陣子，最浪漫的事可借此交代一二。窮山出美女，這村裏最窮的一戶是周家。老周是個二流子。老周媳婦是個謙卑的女人：個子有點高，臉上皺紋比得上皺紋紙，但能看出年輕時是個美女。整天就看周家忙乎，拆牆改院門，因為他家的豬從來就沒養大過，所以家窮。按當地的說法，豬死是院門開得不對。老周的大女兒二勤子是整個公社出了名的美女。我們三個女生中，有一個在縣文工團拉手風琴，她每次回來都說：「整個文工團也沒有一個比得上二勤子的。」二勤子確實好看，要我說，這好看是因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。二勤子說話愛笑，又有點憨，從不給人不舒服的感覺，幹活又特麻利，後面拖一根齊腰的辮子，這算是她的一個裝飾。一年四季，這姑娘都穿同一件衣服，杏黃底帶碎花。天熱了，把裏面棉花取出來，就成了一件夾衣，內外衣一體。天冷了，再把棉花放回去。

二勤子家正對學校小操場。有一次有點晚了，我斜穿小操場回住處，有人在陰影處叫我「小徐」，村裏人都這麼稱呼。我一看，是二勤子坐在她家院門圍欄上，光着上身，兩個乳房有點明顯。我不知所措，隨口應了聲「哎」，